

## ※ 學林誌傳 ※

# 望八自述

小南一郎\* 撰 劉苑如\*\* 譯注

我的母校京都大學，其中國文學研究乃是五花八門、各式各樣。雖然有深具藝術家氣質的青木正兒<sup>1</sup>教授，然我的業師吉川幸次郎<sup>2</sup>教授則繼承了狩野直喜<sup>3</sup>博士的學問。我認為我的學術基礎，即有受到狩野博士學風影響之處。狩野博士是以清

---

本文題目為譯者所擬。最初因製作中研院文哲所「人文來風 Podcast」節目，編撰〈薪火相傳：閱讀小南一郎教授與《唐代傳奇小說》〉一文，乃向小南教授請益，先生親自來函，自述學思，甚為難得。在此春暖花開的時節，又欣逢先生望八壽誕，謹譯注此文，為長者壽。

\* 小南一郎，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、泉屋博古館名譽館長。

\*\* 劉苑如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。

<sup>1</sup> 青木正兒(1887-1964)，日本著名漢學家，也是中國文學戲劇研究家。著有《中國文藝論數》(1927)、《中國近世戲曲史》(1930)、《中國文學概說》(1935)、《元人雜劇序說》(1937)、《元人雜劇》(譯注，1957)等，後結集為《青木正兒全集》(10卷)。青木教授從元曲、元雜劇，到皮黃、梆子、昆腔，莫不涉獵。而這些研究的副產品就是探究中國風味飲食的《華國風味》，以及考證作品中出現的動物草木、飲食、器具等的《中華名物考》。小南教授所謂的「藝術家特質」，應該跟他仙風道骨的氣象，以及結合生活與研究的治學態度相關吧！

<sup>2</sup> 吉川幸次郎(1904-1980)，著名漢學家。研究範圍極為廣泛，舉凡經史子集，以至於詞曲戲劇小說之類，莫不涉足其間，偶亦旁及日本漢學與國學。早年從事《尚書正義》與《毛詩正義》的校訂與翻譯，著有《唐宋傳奇集》、《支那人的古典與他們的生活》、《胡適傳》、《唐代的詩與散文》、《中國文學與社會》、《中國散文論》、《杜甫筆記》、《新唐詩選》、《中國的智慧》、《唐代文學鈔》、《漢武帝》、《中國的宋元畫》、《日本文明中的「吸收」與「能動」》、《三國志實錄》、《元明詩概論》、《論語譯注》、《中國散文選》、《中國文學論集》、《中國古典論》、《中國詩史》、《中國文學史》、《陶淵明傳》和《吉川幸次郎全集》(24卷)等。吉川教授提倡用會讀代替教授單一授課方式。可參見張哲俊：《吉川幸次郎研究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)。

<sup>3</sup> 狩野直喜(1868-1947)，日本漢學家。從中國哲學、史學入手，屬於實證派學者，也是「京都支那學」的開創者，創辦《支那學》雜誌。狩野先生不耐出版著書。他的主要著作《兩漢學術考》、《支那學文叢》等都是他逝世後，弟子們編輯的。

代考據學為基礎，發展出其個人的研究；而我則是通過吉川教授，將這種研究方法成為一己的研究根柢。我被教導「孤證不立」、「一字之證，博及萬卷」，自身也尊崇高郵王氏（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）等考據學家的研究。我認為對於研究者而言，進行深入的文本批評為學者的基本工作；而完成詳實的校對本與準確的日文翻譯，同樣是重要的工作。例如，吉川幸次郎教授所作孔穎達《尚書正義》全卷的日譯工作，誠乃其一生尤為重要的成就。

茲此，我既尊重考證的準確性，另一方面，也思考清朝學者不足之處。我最感到不滿意者，在於清代學者鮮少嘗試探討過往作品與社會的相關意義。基於這種想法，我一直在尋找自己的研究方法。例如拙著《唐代傳奇小說》，日文版的副標題為「悲傷與憧憬」（悲しみと憧れと），也就是說，生活在矛盾與荒謬的社會中的人們，夢想超越既有的世界，但這種期待永遠不會實現，而悲傷由此而生。換句話說，小說作品通過故事的結構，將這種渴望和悲傷具體化、結晶化。就小說本身而言，這種過程相對容易理解，但是就哲學甚或歷史著作來說，其寫作動機也有可能出於因社會矛盾所產生的憧憬與悲傷。我嘗試通過這樣的關注，跨出考證的範疇，發現在此之外還有很多方法，特別是在民族學和民俗學方面。

我學術的另一個基礎，則是民俗學。開拓日本民俗學研究的，乃是柳田國男（1875-1962）和折口信夫（1887-1953）兩位學者。二者學風大不相同，對此差異已有各種解釋。竊以為這兩種民俗學的分歧，在於觀察民間現象角度的不同。柳田國男從生活者的角度（也就是其所說的「常民」），觀察民俗現象<sup>4</sup>；而折口信夫則從眾神的角度看待民俗現象<sup>5</sup>。我的民俗學基本上繼承了柳田國男的觀點。而另一位重要的中國古代文化史家白川靜（1910-2006）教授，我覺得他的民俗學很大程度上是奠基於折口信夫的觀點<sup>6</sup>。

<sup>4</sup> 柳田國男終生致力研究「日本人是什麼？」首次提出日本民俗學的理論與方法，指出「鄉土研究的第一要義是了解平民的過去」，並闡明日本民俗學的研究對象和記錄方法，也就是「由鄉土的人們在鄉土、地方或農村搜集資料」，並以比較之法認識鄉土。參見柳田國男：《鄉土日本》（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。

<sup>5</sup> 折口信夫的民俗研究以神、魂、產靈為中心。參見上野誠：《魂の古代學——問いつづける折口信夫》（東京：新潮社，2008年）。

<sup>6</sup> 白川靜的《詩經》研究認為，萬物有靈、文字有靈、歌謠有靈，民俗取徑類似折口信夫。見白川靜著，杜正勝譯：《詩經的世界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2001年）。小南一郎亦曾著〈白川教授の詩經研究（白川靜先生追悼記念號）〉，《立命館白川靜記念東洋文字文化研究所紀要》第2

在大學三年級的暑假期間，我閱讀了五冊的弗雷澤 (J. G. Frazer) 《金枝》的日譯精簡本，並深受其影響。弗雷澤的學術成果常被批評為書齋裏的民族學，我也曾對其從咒術發展到宗教的進化論框架提出質疑（我的意見是科學乃從咒術發展出來，但咒術與宗教的起源並不相同）。然本書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民族儀式，特別是各種農業儀式，藉此可以思考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的根本內涵。為了回應對弗雷澤作品的興趣，我繼續閱讀了米爾恰·伊利亞德 (Mircea Eliade) 的宗教研究，諸如日譯本《大地·農耕·女性》（節錄自伊利亞德《比較宗教的模式》）等書籍。通過伊利亞德的討論，我得知如何理解神話，如何定位民間信仰，以及設定自己的觀點。拙著《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》是一本深受伊利亞德理論影響的書。

即使對於吉卜力工作室的動漫作品，我特別關注的，還是其對自然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探索。我深感諸如《龍貓》（隣のトトロ）、《魔法公主》（もののけ姫）和《崖上的波妞》（崖の上のポニョ）等作品的共同特徵，既不是以人為本的自然保護，也不是主張自然與人類共存，而是將人類生存的本質視為自然界中存在的生命之一。古代自然崇拜也是基於這一思想。例如出現在《魔法公主》中，一個名叫鈴鹿御前的女性——黑帽大人（譯者案：中文版稱為「幻姬」），自認在以人為本的原則下，進行「破壞森林」（森殺し）的計畫。最後，黑帽大人未能「破壞森林」，反而因此致殘，似乎象徵著當前的人類文明，也對其未來的命運感到擔憂。

從一開始，我對口語文學就比書面小說作品更感興趣。在分析小說作品時，我強調敘事場域的存在，即奠基於此。在我年輕的時候，所有研究民俗故事的人都曾讀過艾伯特·羅德 (Albert B. Lord) 的《故事歌手》(The Singer of Tales)，我亦如此，並思考所謂程式化 (formula)、口述傳統 (oral composition) 等概念，化用在小說史研究當中。

爾後，當敘事學 (narratology) 開始流行時，我也讀了一些與敘事學有關的英語書籍，或許限於語言，未能完全理解。就我印象所及，這種敘事理論作為故事評論很有趣，但是對文學史研究就不太適用。撰寫評論與研究文學史的性質不同，我致力於文學作品的歷史定位，而不是故事評論。

由此或可見「京都學派」云云，其實是被媒體吹捧出來的。實際的內涵尚未釐

---

號（2008年3月），卷頭頁5-11；〈白川先生の學恩（追悼白川静先生）〉，《月刊百科》第531號（2007年1月），頁7-9。

清，我自己也很少意識到我屬於這樣的學派。就像其他地區的學者一樣，京都學者們的研究也具有多樣性，很難只有單一面貌。如果勉強要說，我認為京都中國研究的特色在於文化歷史，而非如歷史學研究的社會史和經濟史。另外，由於地理位置上與東京政權中心相距遙遠，因此研究人員的學術活動（如學會活動）通常鮮少感受到政治權力意志。若以中國來說，就類似於北京和上海學者之間的學術風格略有差異吧！

日本傳統的漢學學者曾說：從大學退休之前都還是學生（學徒時代），此後才開始真正的學術研究。中國有大量的古代文獻，要閱讀並且能大致掌握，必須持續閱讀到五六十歲。但就我自己而言，從大學退休之後，動力畢竟已經不如年輕的時候。我認為，老年的工作就是要重新思考自己年輕時的想法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成熟，重新組織成文章。畢竟，年輕時有必要深入思考人類創造的整個文化，凡此都將成為老年時取得成果的基礎吧！

即使知道這是不可能的，但我真切地想再見到年輕時的恩師。當時我對整個中國文化還一無所知，無法提出深入的問題。如今已經讀了一些書，雖然不足，但終究能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識。如此看來，現在是可以真正地向老師們提問的時候，但卻已經沒有這樣的前輩了。當然，前輩也留下一些文章，但是我認為親自聆聽雅教的指導，相較於只是看書，在質量上都存在著落差。這樣世代相傳的學問可能是不完整的。

近幾年來，我正進行浙江省農村地區寶卷之類宗教文學作品的現場調查。可嘆的是，無法同時對人們的生活進行深入地調查。即使如此，我仍然認為其中存在著一個不同於古代文獻所建立的文學世界。民族學起源於歐洲，一開始描述其他民族的習俗；相對地，另有一派說法則認為，民俗學是一門以在地生活的人為中心的學科，要能心意相承，講述自己民族特有的內在傳承。有鑑於此，我參與中國的實地調查，究竟能揭示出多少，誠令人懷疑。但是，我還是打算將釐清與介紹中國基層文化，作為晚年工作之一。這種基層文化實有異於日本人過去通過中國文學所了解的面貌，並且主導了整個中國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。